

国家为“解放”科威特表现得空前团结，以色列也并没有直接加入多国部队的作战行列。不仅如此，以色列甚至一改其长期坚持的先发制人战略，在海湾战争期间表现得异常谨慎。

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的基本立场及其成因

由于以色列的建立一直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一直身处阿拉伯国家的整体敌视与包围之中，数次中东战争的爆发更使阿以矛盾日益激化且难以化解。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塑造了以色列极具主动性的战术特色，形成了以色列以“境外御敌”和“先发制人”为重要内涵的作战原则^[1]，在面对事关自身安全的潜在威胁时，其一般保持主动出击的战争姿态。

然而，在海湾战争中，以色列却罕见地保持置身事外的基本立场，而从表面上看这并不利于以色列保卫自身安全。以色列政府认定海湾战争会直接危及其国家安全，因而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力，但却在战争期间奉行不干预、不报复的政策。^[2]以色列政策与立场的矛盾，充分体现了其战略规划的高度克制：

第一，不借助“正义战争”行为

来减轻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海湾战争发动的直接目的在于阻止伊拉克的入侵行为，恢复科威特的国家主权，多国部队的作战行动得到联合国授权并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因而在本质上包含了反霸权和反侵略的要素。海湾战争开始后，以色列没有直接利用该战来实现打击敌对势力的政治意图，表现了以色列对通过海湾战争来直接投入本国军事力量的克制。

第二，不因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蓄意挑衅而采取自卫反击。海湾战争爆发的1个月内，伊拉克向以色列发起了19次导弹袭击，共发射约38枚“飞毛腿”导弹^[3]，造成了以色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色列没有选择以自卫反击为由向伊拉克展开报复性军事行动，表明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以色列依然保持了避免直接卷入战争的克制。

被集束炸弹炸毁的伊拉克车队



以色列的强烈克制和表面上置身事外的基本做法，避免了在海湾战争中与伊拉克的正面军事冲突，这是以色列灵活战略应对能力的体现，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改善国家的生存和安全环境是以色列保持克制的根本原因。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实行巴以分治的“181号决议”，巴

[1] Ze'ev Schiff: Israel after the War, Foreign Affairs, Vol.70, Issue 2, 1991, p.28.

[2] Avi Shlaim, Alex Danchev, Dan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ulf Conflict, 1990-91,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4, pp.59-79.

[3]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Gulf War (1991), <https://mfa.gov.il/mfa/aboutisrael/history/pages/the%20gulf%20war%20-%201991.aspx>.

勒斯坦人与阿拉伯国家对决议内容表示强烈反对和拒绝。自1948年至1982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共爆发5次大规模战争,以色列虽然通过军事胜利不断扩展其实际版图,但也不得不面对多重压力:一是巴以矛盾和阿以矛盾不断激化而导致的长期安全危机,以及在地区深陷孤立无援的外交困境;二是连续大规模作战造成的社会和军事负担;三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对以色列非法占领的谴责。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拉伯国家逐渐放弃了通过战争手段来消灭以色列的做法,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基本接受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中东和平谈判进程由此进入缓慢开展阶段。海湾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对以色列的严峻考验,保持克制成为以色列改善地缘政治环境、减少国内国际压力、顺应中东和谈趋势的最佳选择。

由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积怨已深且刚踏上破冰之路,卷入海湾战争非但难以从“正义战争”的角度说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共同抗击伊拉克时搁置矛盾,反而极有可能破坏它们之间脆弱的和谈氛围,甚至重新将双方置于战争险境。再加上以色列与伊拉克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仍从属于阿犹之间的民族矛盾,直接参加海湾战争并不能使以色列规避未来可能面临的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与此相反的是,在海湾战争中保持谨

慎会为以色列创造一定的战略优势,如始终保持武力克制会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以色列不轻易诉诸武力、愿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诚意;以色列将利用阿拉伯国家集中力量共同对抗伊拉克的契机,暂时从阿以长期对抗敌关系中获得喘息机会,使其既有机会进一步夯实在巴以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又能保持充分战斗力以应对海湾战争结束后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变局。因此,出于改善国家地缘战略环境的长远考量,以色列必须做出谨慎选择。

其次,配合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战略安排,是促成以色列极度克制的直接原因。20世纪50年代起,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中东格局的变化和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越来越推动美以特殊关系的发展。美国作为多国部队的领导者,有能力在海湾战争中劝服以色列保持战略克制。美国早已预判以色列直接参战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将以色列排除在海湾战争之外的战略安排,有助于防止伊拉克以以色列为突破口来破坏多国部队的团结,继而影响海湾战争的成效。在多国部队的构成中,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是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派兵参与多国部队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萨达姆政府的侵略行径并“解放”科威特,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将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来看待。一旦以色列加入多国部队,就会迫使这些阿拉伯国家因与以色列处于同一军事阵营而面临极大尴尬局面,届时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相较于阿犹矛盾的权重将会下降,这会严重影响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的团结和联合作战的推进。因此,美国需要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相对超脱,防止海湾战争在共同打击伊拉克这一根本目标上发生偏移。

美国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曾表示,“伊拉克—科威特问题”和“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的两个独立冲突,必须分开处理。^[1]为实现此目标,美以两国的决策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美国总统布什向以色列总理沙米尔施压,即使以色列在遭遇伊拉克导弹袭击后,依然坚持要求以色列政府不进行自卫反击。^[2]以色列接受了美国的战略安排。作为对以色列的安抚,美国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并向以色列承诺,将不会允许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出现对以色列构成不对称威胁的军事力量。^[3]由此可见,美国的劝阻和施压是以色列保持克制的重要外在因素,

[1] Kathleen Christison: Splitting the Difference: the Palestinian-Israeli Policy of James Baker,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24, No.1, 1994, pp.39-50.

[2] Scott Lasensky: Friendly Restrained: US-Israel Relation during the Gulf War Crisis of 1990-9,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 No.2, 1999, pp.27-36.

[3] Furkan Halit Yolcu: An Assessment of Israel's Position in the 1991 Gulf War, *Turk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3, No.1, 2016, pp.165-186.

而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始终坚持不参战与不还击的态度，粉粹了萨达姆政府欲打“以色列牌”来瓦解多国部队的战略意图。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以色列支持多国部队的方式

在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虽然保持着极度克制，没有直接贡献军事力量或发动攻击行动，但出于联军可能轻视伊拉克方面威胁的担忧^[1]，以色列并没能完全游离于海湾战争之外。在保持被动交战状况的同时，以色列主要通过为“抗伊”联军提供援助和对“挺伊”势力施压的方式，与多国部队间低调合作，间接参与到打击伊拉克的行动之中。

在军事上，以色列紧密配合多国部队，帮助提高多国部队的作战效率。作为中东地区快速成长的军事强国，以色列除了军队战斗力强、作战效率高外，其军工体系也处于地区先进水平。海湾战争打响后，以

色列立即向多国部队提供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在对伊拉克进行地毯式轰炸时，以色列为美军的 B-52 轰炸机配置了“哈夫纳普 (Have Nap)”空面导弹，这种导弹“在低空发射时可以攻击 93 公里以外的目标”，其射程范围是美军使用的“AGM-130”动力型导弹的 2 倍，大大提高了联军导弹的整体攻击力。^[2]面对伊拉克在入侵科威特后埋设的逾 50 万颗地雷，以色列的扫雷犁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被安装于多国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上，帮助多国部队成功穿越雷区。^[3]美军使用的由以色列升级研发的“先锋”无人机，向伊拉克发起不间断的空中战斗，夜间瞄准系统更是增强了“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的夜间战斗力，为多国部队高强度的密集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色列还将其军事与医用基础设施提供给联军使用，如美军战舰在前往海湾地区途中可在以色列海法港停留和维护，这为美军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4]

多国部队出动的战机



[1] Bernard Reich: A Brief History of Israel, Facts on File, 2008, p.159.

[2] 龚旭：《以色列的空面导弹 Have Nap》，《飞航导弹》，1991 年第 2 期，第 14 页。

[3] Erkan Dönmez: Mine Clearance Industry: Background, Geography, Funding, Analysis and Future Projections Monterey, California,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2007, pp.34-36.

[4] Mitchell Bard: Arab-Israeli Conflict: the 1991 Gulf War, Jewish World, October 5 2002, <https://www.aish.com/jw/me/48898477.html>.

除了在武器使用、港口设施中转等方面提供支援外,以色列在情报服务上也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关键情报信息,更是助力联军在采取行动前做出更加合理的预判。情报机构是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部门,如并非完全局限于纯军事情报工作的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阿曼(Aman)”,一般会在对地区政治、外交、安全等因素进行考察后,对情报信息进行全面解析,并最终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等做出战略评估。由于多年来以色列的军事情报机构比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关注伊拉克,因此,以色列能够在海湾战争中向美国提供有关伊拉克军事活动的详细战术情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就曾表示,美国在搜寻“飞毛腿”导弹发射器时曾利用了以色列的情报信息。^[1]

以色列还对海湾战争中的“挺伊派”采取了非武力施压措施,从实际效果上防止了海湾战争打击范围和难度的扩大和升级,帮助多国部队集中力量打击在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武装力量。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少有的对萨达姆入侵行为表示支持的国家 and 组织。因在地理位置上与以色列国土直接接壤,约旦和巴勒斯坦极有可能被萨达姆政府所利用,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就曾利用约旦充当伊拉克进口军事物资的中转站。^[2]虽然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终并未直接参与海湾战争,但双方从始至终反对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开战的坚定立场成为联军和以色列不得不认真应对的因素。约旦和伊拉克作为中东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在海湾战争前就长期保持着亲密关系。1990年初,约旦曾允许伊拉克军队在约以边界进行巡逻,

在受到以色列警告后,虽然巡逻行动被迫暂停,但伊拉克与约旦的情报合作仍在继续。^[3]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再次向伊拉克和约旦进行施压,以防止伊拉克军队通过约旦境内或联合约旦向以色列发起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莫西·阿伦斯警告两国,伊拉克军队入境约旦并进行的任何尝试都将被以色列视为挑衅行为,最终可能导致以色列采取军事反击。^[4]

除了防控伊拉克军队进入约旦外,以色列还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严格限制,目的是分散巴解组织在海湾战争中的精力。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至80年代后期,巴勒斯坦的劳动力就业对以色列已产生较大的依赖性,分别占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工人数量2/5和1/3以上,共计12万多巴勒斯坦工人的收入源于在以色列境内的工作。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封锁了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边境地区,阻断了这部分巴勒斯坦人民的生计来源。此外,以色列还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施行了占领24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宵禁,这使得该地区经济发展陷入停滞。^[5]

海湾战争对巴以问题的影响

海湾战争是中东地区矛盾不断激化、冷战格局不断演变的结果。战争发生在世界和地区的新秩序构建时期,它既给巴以冲突迈向和平解决创造了短期内的有利条件,又在此过程中酝酿出了长期影响中东和平进程的不利因素。

首先,海湾战争加深了巴以双方在和解过程中的力量差距。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在综合实力上本身就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在海湾战争中又被进一步加深。

从巴勒斯坦方面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海湾战争时奉行支持伊拉克、反对多国部队的政策,是导致战争结束后巴

[1] Mitchell Bard: Myths & Facts- the Gulf War,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myths-and-facts-the-gulf-wars-chapter-13#2>

[2] Curtis Ryan: Between Iraq and a Hard Place: Jordanian-Iraqi Relations, Middle East Report, No.215, 2000, pp.40-42.

[3] Amatzia Baram: Baathi Iraq and Hashimite Jordan: from Hostility to Alignment, Middle East Journal, Vol.45, No.1, 1991, pp.51-70.

[4] Avi Shlaim, Alex Danchev, Dan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Gulf Conflict, 1990-91,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4, pp.59-79.

[5] Don Peretz: The Impact of the Gulf War on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21, No.1, 1991, pp.17-35.

勒斯坦实力严重削弱的重要原因。巴解组织将伊拉克的入侵行为视为“迈向解放巴勒斯坦的第一步”，早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就曾对要求伊拉克撤军的相关决议提出了异议。海湾战争爆发后，巴解组织还向伊拉克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1] 巴解组织支持伊拉克的政策破坏了巴勒斯坦的国际形象，造成巴勒斯坦在财政、政治、生存和国际舆论支持等方面的实力削弱：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科威特切断了对巴解组织的财政支持，巴勒斯坦的资金运转遭受重击；巴解组织被迫关闭多处驻外办事处，其内部统治也面临严重分歧，政治处境异常艰难；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境内约40万巴勒斯坦人受到驱逐^[2]，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巴解组织原有的国际舆论优势受到损害，对巴勒斯坦争取民族自决、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不良影响。



1991年，科威特人挥舞国旗庆祝海湾战争结束、科威特重新获得自由，
图片来自中国军网

从以色列方面看，由于始终保持极度克制，海湾战争实际上成为以色列巩固和增强自身优势的重要良机。在安全方面，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不仅在核反应堆和常规军事力量方面遭遇重创，还受到联合国的严厉经济制裁，短期内不再具备对以色列构成强有力威胁的实力，以色列的

安全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外，除了在军事上得到美国防空导弹系统的支援外，在经济上美国也给予以色列大力帮扶，布什政府与其达成了一项方案，该方案为以色列提供6.5亿美元的现金为基础^[3]，帮助以色列支付在海湾战争中增加的军事和民防开支。除此之外，以色列人民携带防毒面具、提防导弹袭击的痛苦经历，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以色列在海湾战争中不轻易诉诸武力的理性克制，有利于以色列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其次，海湾战争为巴以和谈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海湾战争爆发前，中东地区虽已存在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外交氛围和趋势，但巴以问题并没有实现更进一步的突破。海湾战争为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着巴以和谈向前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海湾战争强化了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对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性认知，中东主要国家在推动巴以和谈方面越来越形成共识。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导弹，试图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同巴以矛盾相挂钩，这进一步暴露了巴以问题对地区局势发展的强大破坏性，以及该问题存在的泛化性。基于此，国际社会和地区

[1] Mitchell Bard: Arab-Israeli Conflict: the 1991 Gulf War, Jewish World, October 5, 2002, <https://www.aish.com/jw/me/48898477.html>.

[2] Md Muddassir Quamar, P.R.Kumaraswamy: The Kuwait Crisis of 1990–1991: the Turning Point in India's Middle East Policy,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Vol.6, No.1, 2019, pp.76-87.

[3] Thomas L.Friedman: After the War:Israel; U.S. to Give Israel \$650 Million to Offset Costs of the Gulf War,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91.

国家在对推动巴以和谈上都展现出更大的诚意。海湾战争结束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在挪威的艰苦调解下进行了14轮秘密会谈，终于在1993年8月签署了《奥斯陆协议》。^[1]

另一方面，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和干预力的增强，为巴以和谈的推进增添了新动力。随着美国逐渐确定了在中东地区的唯一优势地位，布什政府将尽快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体制视为美国推行“世界新秩序”的“样板”^[2]，改善巴以关系又重新成为美国中东外交政策议程的重点。虽然此前因和谈存在分歧而趋于紧张的美以关系在海湾战争后得到了修复，但布什政府为达成“中东新秩序”的目标，并不愿采取过度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倾向于推行“三轨战略”，加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及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调解力度，力求在巴以地区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作为两个国家的和平共存。布什政府以较为公正的立场介入巴以问题，向以色列施压、重视巴勒斯坦方面的利益诉求、不断改善美国与

相关方的双边关系等，为巴以双方解决冲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海湾战争为巴以问题的边缘化埋下伏笔。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根源性问题，然而，近年随着阿以关系的整体改善，却越来越呈现出边缘化趋势。在海湾战争中，沙特等国家接受美国的保护和联合美国抗击伊拉克的举措，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视作背叛，如“基地”组织视沙特王室为“叛教者”和“美国的走狗”，并扬言对沙特政权发动“圣战”，沙特因而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安全危机。^[3]海湾战争在中东地区造成的负面效应，如权力争斗、政治和经济混乱，以及社会危机，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巨大活动空间，伊斯兰极端主义在“9·11事件”以后日益成为影响中东整体安全的主要因素。进入21世纪后，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和“阿拉伯之春”带来的体系性动荡加剧，巴勒斯坦问题的去核心化逐渐加速。

虽然海湾战争的起因是国际社会试图联手阻止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侵略并非法吞并科威特，但本质上是地区力量失衡和部分国家谋取建立地区性新秩序的体现。海湾战争是一场交战双方实力极为悬殊的战争，出于对改善国家地缘战略环境和配合美国战略安排的考量，以色列在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置身事外的基本立场。但是，由于对伊拉克威胁保持着高警惕性，以色列即使没有直接加入打击伊拉克的行动，但还是通过为多国部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向支持伊拉克的国家与地区势力施加压力的方式，间接参与了海湾战争。海湾战争终结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行为，增强了美国干预地区事务的能力与信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海湾战争虽然创造了推动巴以和谈的利好空间，但也加剧了双方在和平解决巴以问题中的力量差距，并为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地区的边缘化埋下伏笔。海湾战争的爆发没有换来中东地区的长久和平，不仅使巴勒斯坦的弱势地位在战争中继续加强，而且也使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分裂进一步突显。在巴以实力极不对等的现实前提下，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而压制巴勒斯坦方面的诉求，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面对多重复杂因素的挑战。（编辑：安宇衡）○

[1] Hilde Waagee: Norway's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Talks: Between a Strong State and a Weak Belliger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34, No.4, 2005, pp. 6-24.

[2] 陈景：《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与中东安全体制》，《西亚非洲》，1991年第4期，第32—39页。

[3] 李意：《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演变》，《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12期，第30—38页。